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九十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艰苦的历程	张治中(1)
第一节 来源	(1)
第二节 读书	(7)
第三节 流浪	(11)
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徐州会战	刘 斐(25)
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	卢 汉(41)
我对湘西“雪峰山会战”的回忆	邱维达(70)
回忆重庆社会大学	杨 乔(88)
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片断	张 景(100)
我所知道的罗家伦	陈中凡(111)
现代评论派与王世杰	范体仁(123)
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	沈醉 郭旭(131)

艰苦的历程

张 治 中

第一节 来 源

一、故 乡

我的故乡，是安徽省巢县西乡离县城九十里的一個叫做洪家疃的村子。这个村子又叫做“清水塘洪”，是因为在村的旁边有一口大塘，塘的一边是由多数姓洪的聚族而居。这一口塘实在太可爱了。水，终年是清的，除非久旱，水才减少乃至干枯竭；平常的时候，满池碧清的水，明镜一般。杭州西湖的玉泉寺，有一池水也很清，里面养着五色的游鱼。我看，我们家乡那一口塘的水，和玉泉寺的一样清，而面积比玉泉寺的池大多了。

洪家疃在秀丽的黄山南麓。皖南的黄山是天下驰名的，我认为中国的名山，黄山应首屈一指。洪家疃的黄山，我不愿喊它做“小黄山”，我认为它与皖南的黄山是同等的可爱。

这山上常有云彩飘荡着，尽管它不很高，林木不很葱郁，却经常地保持一种碧青色和淡白色，不像一般山的黄赤色。它的品格，由它的姿态、色调表现出来，最端正，最淡雅，最秀丽。看了这山，使人发生和平、冲淡等柔美的感觉。李白的诗：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敬亭山在安徽宣城，也不高，却很秀；我们村子的屏障者——黄山，不但不会令人看厌，而且使你越看越爱。

环洪家疃侧面皆山，黄山是群山的主峰。黄山像一只凤凰，张开美丽的两翼，让百鸟和鸣而飞舞；又像一位老人，端坐华贵的广庭，让儿孙绕膝而团拜。它的左翼是“靠山张”，右翼是“山尾洪”，两翼相距不到五里，像一座玉屏风，峙立在我村的侧面。

登黄山，望巢湖，那是多么美好的境界！巢湖，波澜壮阔的巢湖，白茫茫一望无际的水，点缀着风帆沙鸟。站在山巅，浩荡的天风，可以开拓你的心怀，恢弘你的壮志，激荡你的豪情。你可以尽你的目力远望环湖及湖心的山，姥山山上那一座我们叫做“锥子”的尖塔也可以看得清楚。固然，从我们村子附近的岗上南望，也可以望见巢湖，然而总没有像站在黄山山顶远望的壮观和气魄。

我们的村子是背山面湖的一幅画图。向东十五里是烔炀河，向西十五里是长临河，向南二十里是忠庙和四顶山。四顶山是一座名山，忠庙是一座名寺。四顶山在离忠庙不过三里的湖边，山是四个顶，远望四峰，对峙竞秀。

在黄山东麓有一个大庙，叫做指南庵，我记得，在我幼年的时代，香火还是很盛的；光复^①那年，庙被焚毁，一直没有修复。抗战前，我想把指南庵修复起来，一方面保存古迹，一方面做研究佛学或研究其他学术者的栖息之所，已经预备烧砖瓦了，因为抗战军兴而停止。

这个寂寞古老的洪家疃村，在交通方面，淮南铁路及合巢公路经过它东面十五里的烔炀河，东南与芜湖、南京相衔接，朝发夕至。

洪家疃的居民约有百户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，男耕女织，各司所事。但是终岁辛勤，仅得温饱，有的还得不到温饱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教育一向是不发达的。读书，被看做是特殊阶级

① 指辛亥革命。

的专业，过去科举时代这里只有秀才，民国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，风气太闭塞了。我在一九二九年创办一所黄麓小学，后来扩充为黄麓乡村师范，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、青年，才开始领受现代教育的洗礼，读书的风气才渐渐展开，后来不仅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、青年获得就学的方便，皖北各县的来学者也日益增加，俨然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心。

我怀念我的故乡，更怀念我先人的庐墓。离我的家，向北走不过百步，是我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的长眠之所。我盖了一个小小三间屋的墓庐，我们叫做坟庄。我回乡时，总喜欢住在这墓庐里。有一年在家乡过旧年元旦，大雪纷飞，自己一个人静幽幽地走进坟庄的园里。雪越下越大，像百万玉龙盘舞。我孤清清站在雪花中，俯看山麓的村庄，和平，幽静，纯洁，一片粉妆玉琢的乾坤。山泉淙淙，奏出天然的美妙的乐曲。这时，我浑忘了世界的尘秽，撇却了人生的疾苦，这宇宙和人生都像一片白羽，纯洁而光明。我仿佛到了一个化境，一个超然出尘，遗世独立，飘飘乎欲仙的化境。我相信，这种意境，是渊源于我对可爱的黄山，可怀念的故乡，可永远瞻仰纪念的先人庐墓的深厚感情，这种感情不断诱发我敬恭桑梓和息影林泉的愿望。

我常常回到故乡去。这不但是一个休息的机会，也是我静心思考和接近民众的机会。其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次是我在“八一三”上海抗战以后回乡小憩的四十天。战前三十天的准备工作，从八月十二日到九月二十三日整整四十天指挥作战的辛苦，使我的身体疲惫不堪。九月二十五日从前方回到南京，虽已调任大本营重要职务，也不能不请假回乡稍事休养。到了洪家疃，大家几乎不认识我了，惊问我为什么这样消瘦。我一回到家乡，如释重负，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。

我在休养期中，也和每次回乡一样，常向黄麓乡师学生讲话，大多讲些求学做人作事的道理，把自己亲自体验的现身说法地讲出来，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应该有恢弘的抱负、坚强的意志和

奋斗的精神，应该关怀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。同时，我在他们面前，表示对政治生涯的冷淡。我并不希望做大官，但愿有一天回到乡下，做一个小学教员或师范教师，也许在教育上的贡献，比在政治上的要大一点。我也常把孙总理的遗训启示他们，青年要立志做大事，不可希望做大官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我说很多话鼓励师范生，要他们为农村服务，埋头苦干。因为我们乡下总免不了一种观念：做官是好的，做差事是好的。这成了一种社会趋向，父母教儿子读书，乡党期望子弟上进，全是为的做官。所以我想矫正一般人的不正确的观念，使大家认识做下层实际工作的重要，使大家知道为乡村服务是国家民族的基本工作。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，如果乡村的优秀青年，不能在乡村工作，不能为农民服务，而趋向政治活动，做官，干差事，把乡村风气弄坏，人才减少，这不是国家的好现象，倒正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。我分析这些道理，警觉黄麓青年。

黄山虽好，可惜树木少，我提倡植树造林。有些池塘没有鱼，我提倡养鱼。这时清水塘干了，是由于塘身太浅，蓄水不多。我提倡挑塘，把塘掏深。我自己带头下塘，领导大家踊跃挑塘。村里的人笑着说：“总司令^①挑塘！总司令挑塘！”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劳动是一种很愉快的事。

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。我有一个实验乡的计划：北自淮南铁路，南抵巢湖，东起烔炀，西至长临，筑成环乡的乡道，再在各村修村道；同时，办一百所民众学校，其他一切按地方自治原则办理。我曾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多次商量，想把乡师逐渐扩大，成为大学，附设一所中学，若干小学。此外如科学馆、天文台、图书馆、医院等，应有尽有。我脑中常常涌出一幅美丽的图案。可惜我的理想刚生了芽，尚在计划阶段，而战角在烽火漫天中吹起来了。

^① “八一三”抗战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。

这一次回乡小休，曾在四顶山小住十余天。四顶山，像上面说过的，是巢湖湖边的一座名山，面着大湖，松树成林。我在山的第二顶上盖了小房三间，终日悠悠地在山上林间，踱来踱去，晒晒太阳，看看山色湖光，忠庙、孤山、姥山尽入眼底。远望白石山和巢湖南岸诸峰，参差如列玉屏。我常常一个人静悄悄坐在山头，面对巢湖，天风浩荡，襟角飘开。每遇这种境界，顿忘尘俗，栩栩欲仙，觉得心灵上受着莫大的益处。

有一天，是我的生日，家里的孩子们，由长女素我领着，从二十里外的家步行到四顶山来了。那是一个清晨，我正坐在山头一块大石上观赏景色，忽然一阵歌声从山下传来，渐近渐清，听出是我的孩子们的歌唱，边走边唱，为他们的父亲庆寿，祝福。这一种情景，大自然的殊恩与天伦间的至乐，交流合响而成为人生的幸福的源泉，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回忆。

我对于故乡的父老，从小就礼貌甚周。望见长辈来了，远远打招呼，先喊他，所以父老很喜欢我。我始终尊敬父老和长辈，他们对我也情意深厚。我每次回乡，一定要与父老及长者们谈谈，问候他们，也请他们喝喝酒，吃吃饭，有时也掷掷骰子。我掷骰子的方式与众不同，我预备了许多铜板，每位各给一份，只准押一注，输的归我赔，赢的带了走。我觉得这些长辈们应该受我的尊敬。我每次回乡，有一定的程序：进祠堂祭祖，上坟扫墓，分别恭请张、洪两姓长辈公宴，敦约周围十多个村子的六十以上老人聚餐。抗战胜利后，我也曾一度回乡，只是湖山依旧，长老凋零，不禁感慨无已！

二、家 世

在遥远的年代，大概是明朝末季吧，从江西迁移到安徽，落籍在巢县西乡的四大房姓张的，那便是我的祖先。张家四大房分住四个村落，我们是四大房中的长房，靠着黄山山脉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，叫做“靠山张”。我家这一支以后又移到洪家疃，相

距也不过一里。这四大房就叫做“四房张”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四大房中好像是没有做官的，连念书的人也很少（进学、中举，根本没听见，仅有几名童生，都没有得过“功名”），大都以务农为本业，有少数做手工的，经商的也少，一族人安分守己地度生活。

我的祖父名邦栋，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者，性情刚正，常说直道话。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，很少离开洪家疃，只有在他的儿、媳——我的父母——居住丰乐河的期间，偶然去过冬，可以说，他毕生没有出过远门。祖母是洪家的女儿，早去世，我没有见过。

我的父亲名桂征，从小念过书，能写信、记账，粗通文理。他是一个蔑工，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，即蔑器店，当然是非常辛苦的。父亲为人老实忠厚，是一个柔和的人，与祖父的刚直的特性两样。我的叔父名桂荣，也是蔑工，也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蔑器店。

我的母亲，娘家姓洪，从小操作辛苦，得了气喘病，终于因此而早死。她生了我们弟兄四人（中间还有一个妹妹，早夭），带着病照理家务。这是一个贫寒家的家务，她要自己烧菜，煮饭，洗衣，还要督促蔑器店里的伙计学徒们工作。她是一位慈爱、和平、厚重的伟大的母性。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，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！譬如我今天有一点成就，最初的一步是由当年不安于丰乐河学徒生活而毅然出走，到安庆考陆军小学。按当时的环境，没有母亲的支持，我要迈开这第一步是不可能的。首先我的父亲就不赞同，只有我的母亲，仁慈的母亲，她独立地赞助我，密切地注意儿子的前途。她费尽心力，七拼八凑给我筹了二十四元的旅费，鼓励我求学，远行。她常常看着儿子的大处远处，教诫我，提掖我。她把一句我们家乡的格言——咬口生姜喝口醋——给我作座右铭。这句格言，就是叫青年要尝尽酸辛，历尽艰苦，才能成人立业。以后我把这一句话——慈母的遗

教，请于右任先生写了一块横匾，挂在坟庄里，作永久的纪念。我之有今天，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。慈亲的遗训，不但我永不能忘，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。我愿我的子子孙孙，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。

这就是我的家世简单的叙述。我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，不是世代书香，只有代代相传的劳动者的血液。我对这个平凡的家世，从心里感到有一种自信和自豪，它遗传给我一些美德，特别是给了我长期的磨练。

第二节 读 书

一、入 私 塾

丰乐河镇上有一个由李先生主持的私塾，他是我的启蒙老师。读了一年后转入一个较长的打根基的阶段，前后七年，业师是我的叔舅父洪子远先生。中间曾从丰乐河唐先生读了一年，最后又从“长冈张”张来轩先生读了一年。我在私塾一共读了十年。

我从洪先生读书的程序，与一般不同，是先从难的书读起，先从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读起，反过来再读四书。背书的方式，也与一般不同，五经、四书整本整部地背，硬是那样蛮干。如上下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连“朱注”都要一齐背。我的那位叔舅父业师教学认真，督责极严，我虽有很强的悟性和记忆力，也得要苦读，苦背。

我的业师是怎样的严法，只须看他拿的那块厚厚的无情的板子。我现在的右额上还隐隐约约保留着一条创痕，这就是被先生打的“古迹”。背书时，偶然脱一脱，那块无情的厚厚的板子刷地一响就落到头上，往往头破血流。至于罚跪，打手心，罚一顿不吃饭，几成为当时私塾的一般风气，毫不足怪。

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回忆：夜静更深，我还没有放学，我的

母亲不放心，体念这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儿子，一个清瘦的小孩子。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，从壁缝里，门缝里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，等我放学出门时，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。慈母之泪，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！

有一次我被罚不吃饭，我的可敬可怜的母亲，知道她的儿子受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处分，心里更发难过，她买了两个“粑粑”偷偷地送给我吃。我到底是一个小孩子，回家时，我哭了，母亲又以慈爱的心情来安慰我。

现在想起来，这种对待学生的方法，未免过于旧式，以我的聪明，似乎不需要运用这种笨拙的方法。然而正因我的叔舅父洪先生期待我最真最切，所以也格外从严。以后从丰乐河回到洪家疃，还是从洪先生读书，这一个时期便轻松得多了，他的教学方法也改变了，而我已是十一二岁的少年，从“小学生”进到了“大学生”的阶段，也就没有受打受罚的事了。

我应该说说私塾生活的情形。论家庭，我是读不起书的，而我竟能在私塾读了十年，实在是勉强万分，所以我个人的生活状况，也就可想而知。记得在洪家疃前面冈上梨园读书的时候，一共二十多个学生，只有我和两个同学住在私塾里面，共同“起爨”，即三个人共同出米煮饭，但是各人吃各人的菜。一个同学是本村富户，餐餐吃肉；一个同学是外村一个寡妇的弱子，也由他家里常常送好菜来；只有穷孩子的我，每顿总是吃的小菜饭，望着人家垂涎。父母远在丰乐河，只有祖父和我二姑父母住在家里，有一次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要厨子回家去要点肉来吃。可怜的祖父，感慨地对厨子说：“肉吗，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！”我听了祖父的话，心里实在难过已极，深悔自己的孟浪。以后见了祖父，祖父也对我说：“那一次你要肉，哪里来的肉？”同样的一个惨淡的回忆：在丰乐河的时候，我生了满身疥疮，有人说：“吃猪油蒸红枣，可以健脾，疮可以好。”我告诉母亲，母亲黯然地说：“饭都吃不周全，哪能有什么猪油蒸红枣！”

我睡的床，只是一块木板上垫着一铺稻草，上面覆着一床烂棉絮。热天只有一顶稀烂的帐子，四围八方都是孔，大孔小孔，补了又补的。然而由于一天读书疲劳，仍然得钻进去睡。当我睡熟的时候，也正是蚊子大肆活动的时候。曾记有一次，我的业师拿着扇子替我赶蚊子，我才为之惊醒，心中感谢不已。

我那两个同住在一起的同学，虽然家道小康，生活一切比我好，但念书总赶不上我，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。可见在私塾里，在幼年时，吃点苦头，不但没有害处，还大有益处——我常常是这么想着。

我另外还从了一位唐先生读书，是在丰乐河。这是一位“老好人”，学问很平常。他那个私塾的房子很湫隘，学生并不多，他又常常管外事，给学生的负担也很轻，用不着怎样出力。这一年没有多大进益。

我读私塾的最后一年，是在长冈张村西峰庵从张来轩先生。他是秀才，很器重我。他感慨似地说：“教了几十年书，才遇着这一个聪明学生！”这时读《左传》是一门正课。我通常只读一二遍就烂熟，张先生非常惊奇，逢人称赞：“这孩子将来大有希望。”他有一次与一个老年人谈到我，说：“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，将来了不得！”现在张先生已作古了。回想他的为人，品貌好，做人好，国学根基深，虽在他的门下只读了一年书，而所受国学的启迪益处很大。

他欢喜喝杯酒，有一个小小的瓦盆，通常放一点咸菜，午饭前他总是吃点酒，就拿那一点咸菜下酒。有时没有酒了，他脱下马褂叫火夫去当四毛六毛钱，买酒吃。我对他的印象很深。他是一个很严正很慈祥的老人，具有安贫乐道的精神

西峰庵在山冲里，前面一排松树，风景很好。这时因为我已经有了底子，读书生活比较轻松，不论开讲、做文章都不太吃力，因此我和一些同学居然有散步的闲情逸兴，可以说是我少年读书时期最快乐的一年。

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，是从我的叔舅洪先生读书的时代。他考过多次，虽没有进学，但许多进过学的人不及他。他一生没有旁的嗜好，自小苦学。在教书时，对自己的约束很严，讲到学问，一点不放松，除教学生以外，自己一天到晚不断地诵读写作。他做人是很厚道的；以后他在地方管事的时候，有些人嫌他软弱，坏人不怕他，他没法对付坏人，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厚道。我对他做人的不苟且，存心忠厚，态度端正，是很敬佩的，所以我们永远保持很好的感情。

我在私塾读书时受的是旧式的教育，至于学问是怎样，怎样应用到实际的人生，怎样与国家民族有关系，可以说根本谈不到。现在十岁左右的孩子常识就很丰富了，对国家民族就有相当的认识了，而当时的私塾学生，不过是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罢了。

二、考秀才

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去考秀才。我为什么忽然考秀才？原因是这样：那时科举制度在将废未废之际，不过八股已改作策论了。我在私塾读书，以我的作文的优异，先生认为我可以去试试，考一下秀才。我记得：我的父母都以为“念长书”的目的，是要猎取一点“功名”，而猎取“功名”的正当途径，自然是考科举。其实，我自己是糊糊涂涂的。这一个“功名”的猎取，对于我究竟有什么益处？益处在哪里？我当时真莫名其妙。

考试分三个阶段：县考、府考、院考。我没有参加县考，是直接参加府考的。但必须完成县考补考手续。府考、院考都在合肥，是由我的父亲亲自护送去的，住在合肥城内一家旅店里。考试的日子，三更天就携起考篮和干粮进场。点名进场后，就封考场门，出题，做文章，缴卷，出场。第一个程序，要一天两夜做完。考场里最难受的是大家不能出去解手，每人桌下有一个瓦罐子装尿屎，臭得熏人，闷气得厉害，真难过。

我的府考考得很高。那时发榜的方式，不像现在的一般学校，而是用一种圈形排列名次的先后，越是在圆圈的里层，地位越高，大概圆圈中心点的一名就是“府首”。我的名字离那中心点很近，好像是最里面的第二圈的前排。

当我再到合肥考院考的时候，有些人是知道或听说我聪明过人的，看见我生得清秀，都说：“小秀才来了！”但是我毕竟辜负了大家的希望，院考没有取上。父母的热望，亲友的期待，被泼了一瓢冷水。我为什么取不上？我想字写得坏，或者是一个不能取上的原因。别人一个格子端端正正写一个字，我是三个格子拉拉扯扯写两个字，这也许有点关系吧。

科举是清王朝用来桎梏人才的方法。我虽没有考中，对我毫无损害，反而打断“功名”的一线希望，唤起了奋斗前进另找出路的决心。

第三节 流 浪

一、吕德盛号学徒

吕德盛号是一家商店，在丰乐河镇上。丰乐河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它离我的家乡有九十里远，隔着巢湖，是安徽合肥县的一个市镇。这一个市镇，以“毛行”为交易的重心，是鸡鸭鹅毛的出产地，通常是有人坐庄采购，经过三河（三河是一个市镇，是一个较大的米市场，离丰乐河十五里），出巢湖，下芜湖，运销出去。

吕德盛号是一家卖布匹、糕饼、油盐、桐油、纸张、香烛、碗盏及其他杂货的百货商店。丰乐河镇只有临河堤上的一条直街。吕德盛号是丰乐河镇上数一数二的大铺子。吕老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，很勤谨，很守本分；弟兄三人，他是老大，名叫吕为才。

有一年，吕德盛号新收了一个学徒。这学徒便是我。我为什

么忽然又去当学徒呢？经过的实情是这样的：

在考不取秀才以后，就想进学堂，但是家境太困难，决不能供给我的学费。既然进不起学堂，又想继续去考科举。我自己当时还相信：以我的聪明，迟早总会取得功名的。不料科举又停了，于是这一个希望宣告断绝。我的念头又转过来：既然无力进文学堂，如果有武学堂，何妨去考考。那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扬州十二圩当哨官，听说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，我就到十二圩去投奔那亲戚。等了好久，随营学堂并没有开办，冤枉跑一趟，只得又挑着一个“失望”的担子回家。

进吕德盛号当学徒，就是在这次郁郁回家之后。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。我的母亲的干女儿，是吕老板的老婆，父亲与吕老板也熟识，便把我介绍进去了。

吕老板知道我是读书人，仪表，态度，举止，与一般学徒截然不同，所以不把我当做普通学徒看待。大约服务了三个多月，我学会了打算盘，他就叫我写账，算账。但是普通学徒应做的工作我还是去做，像早起洒扫，收拾铺房，抹布架子，清理糕饼，洗茶杯，泡茶，客来敬茶，照应顾客，等等；还有老板盖新房子，我有时也去做小工，也淘过阴沟。凡是我可以做的事，不待老板的督率，常常自动地去做，一点不躲懒，虽不知道什么叫做服务精神，工作却是相当勤快的。只有一件事我未做过，就是没有替老板、管事的铺床，倒便壶，这是他们特别给的面子。

店里的生活方式，现在想起来极有趣味。第一是吃饭。平常吃饭，只是一两碗青菜，每逢初一、十五才有肉吃，我们叫做“吃荤”。盛一碗满满的饭，夹些菜，端着碗，就站在柜台上吃，吃得很香。遇着买东西的人来了，马上放下碗和筷子去招呼生意，生意第一，吃饭第二。

第二是睡觉。吕德盛号是两层楼的房子，我们都睡在楼上一间宽大的房子里面，排列着许多床铺，又堆积着许多货物。也有一个时期睡在楼下柜台里，地板上。夜晚把被褥打开，铺在地板

上，清早又把铺盖卷起，搬出来。睡得迟，起得早，不过并没有睡眠不足的感觉。

我在这一个“宝号”中，除做日常工作外，唯一的安慰就是看书。最喜欢看《纲鉴》，其他书籍，只要能到手就看，我有手不释卷的精神。我不甘心就这样做一个生意买卖人。初入店的时候，在一个新环境的刺激下还不觉什么，不久以后，我的内心渐渐感觉苦痛起来了，好像自己是受了委屈：难道这个样子就是出路吗？难道做一辈子生意不成吗？

一面工作，一面考虑自己的前途。对于求学的事，梦寐也不能忘。当时丰乐河镇上是没有报纸看的，每逢得着从外埠包货来的旧报纸，不管一张半张，不管怎样破烂，不管何年何月，我总是把它留下，里里面面看过。有一次，忽然看到从芜湖包货来的一张报纸，是上海的《申报》，上面登着“安徽陆军小学招生”的消息，我的心，雀跃般地喜欢极了。我想，可以去投考了，这一个机会再不能放弃了。同时，我知道有一个瓜葛亲在安庆省城测绘学堂当学生区队长，并且知道他放暑假回来了，我就找到了他，他答应在快要招考的时候通知我，并且在省里帮忙。我下了最大的决心来找自己的出路。

一个很好的做生意的生活，凭空地忽然放弃，这在一般人的眼里是有点奇怪，我的父亲也不赞成我这一着。同情我的，了解我的，赞助我的，只有我的母亲。她关心她儿子的生活，更关心她儿子的前途。学生意，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，但这却不是她儿子的出路；如今既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儿子见到了，怎好轻易放过。她不知费了多少心力，东拼西凑，替她的儿子凑了二十四元做盘费，到安庆省城去投考。这是毕生难忘的二十四元，这不是钱，是母爱，伟大的光辉的慈母之爱。

二、流浪十二圩

扬州十二圩，我先后去了两次，度着流浪生活。

在我考不取秀才又无力进文学堂之后，听说十二圩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，我带着希望去投奔一个远房亲戚。这亲戚姓洪，是我祖母家的远房，我应喊他做表叔。他带着舢板船，当一名哨官，是保护盐务的武力。我初到他那里，因为是来投考随营学堂的，他对我态度还好，愿意帮忙，使我有成就。哪里知道，一等再等，这个学堂一直没有开办的消息。我越等越着急，越住越着急，而我的那位表叔呢，他看见随营学堂不开办了，我没有希望了，就渐渐地对我冷淡起来。我吃的是“冷眼饭”，就是“冷眼饭”也常吃不饱。船泊在小河叉里，有时，我一个人坐在船头，芦苇上的一粒清露，辉映着我眼眶里的一滴泪珠。船主人有点不耐烦了，而我仍想再等一等，吞着眼泪再等一个最后的消息。

随营学堂终于没有开办，我终于听了亲戚的劝告回家了。这一个短短的时期所受的心灵上的痛苦使我至今不忍回想，依人的无聊，寄食的苦况，实在难以形容。记得临走的时候，那位表叔给我开了一笔账，把原来给我的零钱和伙食费一齐算足，另外凑上给我的回家旅费，总共是十三元，并且叫我写一张“借条”，以为凭据。这一张“凭据”，在我回到丰乐河的第二年，他就派人拿来向我父亲把欠账讨还了。

我第二次到十二圩，是在我“气走安庆”之后。我为什么“气走安庆”呢？跟着后面我就要说的。安庆是不可一朝居了，然而我离开了安庆，又到哪里去呢？又去干什么呢？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，没有事情可干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到扬州十二圩去找那位远房亲戚，也许随营学堂会开办，看有没有机会进去。

好容易奔到十二圩，也没有事可做，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。我看十二圩的情形，盐的气氛弥漫了一切。盐商是头等的巨富，而搞盐的工人却是劳苦而赤贫。他们有气力，还可以惨淡地生活着。我是一个瘦弱的青年，被人们看不起的穷小子，天赋我的生存权利，我向何处去求？我没有路可走了，但我仍要奋斗。我想：索性当兵吧！

我投到当地的盐防营，而这一个营里没有正额可以补，只谋得了一名“备补兵”，待遇是极可怜的。首先是“住”的问题。名义上是住在营内。而实际上没有一定的铺位，遇着哪一个铺位有空，就补上去睡；如果没有空铺，就叫你睡不成。我记得，我每天晚上，总是抱着一床被，到处找地方睡，清早又抱起这床被离开这地方。

睡觉的问题虽艰苦，还不要自己贴钱。备补兵根本没有饷，不像正额兵每月有四两二钱银子。比睡觉更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吃饭。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，叫做打“伙食圈子”。我哪里去找钱呢？唯一的办法只有进当铺。十五里路外的仪征县城的“当铺”是我这个穷备补兵的“银行”。为着维持“食”的需要，最初是当衣服，当其他零碎东西，后来当光了，没有东西可当，就当汗褂子。有一次，来回跑了二三十里，才当了四毛钱，维持那无情的“伙食圈子”。

备补兵也有工作，就是：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了，就代替站岗或者是跟随正额兵上操。唯一的希望是正额兵出了缺，出了缺就有补上的机会，偏偏那些正额兵不大容易出缺。这样在盐防营里当一名备补兵，苦干了三个月，岁月蹉跎，始终补不到一名正额兵。我觉得这样下去，太不是办法了，我不能不离开十二圩了，想不到我的遭遇这样苦！

还有一个原因刺激我下决心离开盐防营，就是在备补兵期间，碰见一个班长，他是一个“头目”，一个流氓。不知怎样的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开罪了他，他对我的态度特别的坏。有一天，他对我摆出一付可怕的狰狞的面孔，很凶恶的神气，威吓我，骂我（我不懂他说的一些什么话，但知道他是辱骂我），幸而没有殴打我。这是一个谜。我至今仍想不起那一个班长为什么这样对我。

我当时怀着很大的忧郁与恐怖。我想：那班长是流氓，流氓是不好惹的，动不动就是“白刀子进、红刀子出”，我何必冒犯这危险？被人歧视、欺负、侮辱，难道一个备补兵就是这样的奴